

郭沫若

经典作品多元化解读

主 编 ◎ 陈俐 陈晓春

市義流疊作三樞運新
鮑三澤示早午冬時
裴思玉霜潛龍無只
井同山月向為故人注龍
首缺
郭沫若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丁 丁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经典作品多元化解读/ 陈俐, 陈晓春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5614-3308-5

I. 郭... II. ①陈... ②陈... III. 郭沫若(1892—1978)—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9855 号

书名 郭沫若经典作品多元化解读

主 编	陈 俐 陈晓春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 × 202 mm
印 张	9.75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2 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杨胜宽

在我国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变的过程中，郭沫若的作品为我们矗立起一座文化大山，这是我们在通向更新的文化路途中无法绕过的文化大山，我们必须逼近和直面它。我曾经在《搭建郭沫若研究的开放性话语平台》（《文艺报》2005年3月31日）一文中提到：“郭沫若研究队伍的整体实力很不理想，存在诸多隐患。其中之一就是集中主要精力于郭沫若研究的中青年人越来越少，青黄不接的危机已经呈现。年轻一代缺少郭沫若所经历过的特殊时代风雨，先天地具有一种历史的隔膜。他们如果不全面深入地了解郭沫若生存的时代背景，简单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郭沫若的人生选择和行为方式，那只能得出对郭沫若横加指责的结论。这就是今天的不少年轻人为什么对郭沫若不感兴趣，甚至加以批评、嘲笑的原因。”

我院陈俐、陈晓春教授主编的《郭沫若经典作品多元化解读》完稿成书，在帮助青年了解郭沫若这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郭沫若研究界的这一遗憾。此书从主编到撰稿人多为乐山师范学院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因此对“郭沫若给当代青年带来什么”的话题非常感兴趣。他们以郭沫若的作品为对话的平台，去引导青年学子正确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现代文化名人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和价值；同时，也试图通过本书的编写，认识和回答郭沫若的作品是否可以作为文学经典，去超越当时的时代而衍生出“当代性”。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许并不是这一本书能彻

底解决的，但它无疑触及了当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并且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非常可喜的是一批年青学子也加入到郭沫若研究的对话行列，提出了他们虽然有些稚嫩却非常鲜活的观点。由此，本书形成师生在教与学方面的互动，为郭沫若研究找到一个很恰当、很新鲜的角度和形式。

本书从内容到形式的活泼，还体现在解读方法的多元化：文章不仅运用了常见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同时还运用多种批评方法，如对《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的解读，运用了心理分析批评；对《遥寄安娜》、《柱下史入关》、《丁东草》（三章）的解读，运用了形式主义批评；对《凤凰涅槃》、《光海》、《天上的街市》的解读，运用了神话原型批评等。甚至在同一篇文章的分析解读中，追求几种方法同时运用。如对《天狗》的解读，从社会历史、自我表现、生命哲学、神话原型、解构主义等多重方法去充分发掘这一诗歌的经典意义。通过各种批评方法，灵活联系写作背景，透辟分析作品特点、精细发掘各种意义，从不同角度挖掘郭沫若作品多方面的价值。在分析诗歌作品时，不仅注意到对诗歌语言文字的解读，还特别注意到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表演功能的角度去还原诗歌特有的艺术魅力。如对《凤凰涅槃》的解读非常注意从诗歌表演功能去还原特有的审美感受。对《天狗》的解读则非常重视朗读表演效果引发的艺术想像力。在对郭沫若叙事性作品的解读中，作者更注意从文化批评的宏观视野，从历史和当代两个维度切入，把作品放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的进程中，深挖作品的社会文化价值。如在对《少年时代》、《孤鸿——给成仿吾的一封信》、《银杏》、《柱下史入关》的解读中，作者们指出：郭老这些作品中，既有对文史不分家的原始文体特色的一种追随，也有类似“后现代”的“先锋”手法的运用。从不同层面审视其意义时，会发现它们包含着由宏观社会波澜和微观生活细节、主观激情和客观写实、简单

文字和玄妙奇想等形成的巨大张力，以至可将其视为充满强烈文学色彩的历史与哲学著作。这些见解触及的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拓宽了研究郭沫若作品的范围和思路，明显带有学术探讨的性质。

此书选入的郭沫若作品，不仅有被学界已经公认，并且进行过深入研究的经典作品，而且有未曾获得广泛关注，或者在研究中，只被粗略提及，但参加撰写者在阅读中感到不可等闲视之，在今天应该重评其价值的作品。如对新诗《光海》，本书作者别开生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此诗表现儿童心理的原型意义。另外，将《孤鸿——给成仿吾的一封信》选入本书，从书信体散文的角度剖析郭沫若在五四退潮期的人生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其旧体诗词《鹧鸪天——吊杨二妹》、《遥寄安娜》的选入，反映出编写者更加注重郭沫若在人生道路上复杂的心理感受。这些诗歌既闪耀着国势飘摇、救亡图存之际的强烈爱国精神之光，又蕴涵着深沉宛曲的离愁别绪、爱情憾恨等。在艺术表现力上，这些诗歌也有巧妙运用张力，时空穿透力强，言略意丰的特点，对当今人们如何看待旧体诗词的生命力的问题，很有启迪。

本书在编写形式上，有很强的适用性，它不板着脸孔搞学术，而是从普及的角度考虑，突出了行文的生动流畅、深入浅出；活泼的师生互动交流；适当的背景介绍、点评、注释，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有助于读者了解、观照郭沫若的生存遭际、复杂情思，他的文学创作风格，他笔下流淌出的诸多经验教训，并从中了解中国文化传统，获得审美享受和学术滋养，避免文化偏食。就当下而论，它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一，它有助于读者公正看待郭沫若的人格。这些年，某些人因人生遭际与性格差异，或“后现代”情绪膨胀等，肆意贬损郭沫若的人格，试图通过以炸掉其人格基石之法，动摇他所创建的巨大成就殿堂。此

书中的一些解读文章，在涉及郭沫若的人格问题时，有较为公正的论说，对读者起一些释疑解惑作用。其二，它有助于读者公正、全面地看待郭沫若的贡献，高度重视并继承发扬他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郭沫若是在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方面有着卓越建树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但在这些年，不少年轻读者、论者限于生活阅历、习惯爱好等，对文学批评中的博观、细读、唯物辩证要求，对相关历史背景，当今生活深层实际，尚未了解或了解不够，既不能让情思到达历史现场，也不能充分透视现实需要，往往说郭沫若的诗“不深刻”，“读不出诗意”。这些片面的阅读感受，如遮蔽视野的雾霭，以致使郭沫若的作品似乎有被今天的青年一代遗忘之感。年轻人是否喜欢某人的某种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受所处环境，特别是学校教师及社会传媒等的影响。此书中的一些解读文章，涉及这些问题的论说热风，起到一定的消除雾霭的作用。因此，此书既适合作高校中文系的一种选修课教材，或大学中文系教师及一些“郭研工作者”的参考用书，也是想通过自学了解郭沫若创作，获得美的享受、智慧启迪等的青年朋友的一种好书。

当然，《郭沫若经典作品多元化解读》也存在着诸多遗憾。由于人手不大够，时间不充裕等原因，对郭沫若的经典作品的选择和评价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对某些作品的解读上，可能由于编写者目标的限定，似乎存在着过度阐释之嫌。书中文章，有一些出自匆匆的时间之流，尚未做到毫无缺憾。尽管如此，此书着眼于“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普及，在普及中提高”的原则，这是值得提倡的良好学风。在本书即将出版时，我谨向它的主编及撰写者们致以热烈祝贺，并希望他们更加关注学术风云，继续推出大放异彩的崭新成果。

郭沫若的作品给当代青年带来什么

——代前言

关于经典，有一种另类的解释，即经典就是人人都在说，却人人没有阅读的书。郭沫若的作品在今天的遭遇，似乎应验了这一另类解释。同其他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一样，它们似乎被今天的青年一代遗忘了，准确地说，是被引领大众阅读口味的时代抛弃了。一个曾经奋力为大众写作的人，最后被他一生钟情的对象所抛弃，这是一个历史的反讽、文化的悲哀。郭沫若在当下遭受的冷遇，应该是一种文化的集体失忆。但是我们还是要乐观地说，这种失忆只是一种瞬间遗忘，因为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忘记它的文化血脉的，在我国文化传统发展的链条中，郭沫若的创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缺了他，文化传统的传承就呈现出断裂；缺了他，文化传统的陈旧格局也不可能发生变革。英美意象派诗人艾略特曾提出评价诗人的基本标准：

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批评的原理，美学的，不仅是历史的。他之必须适应，必须符合，并不是单方面的；产生一项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遇了一个新事件。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

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传统与个人才能》）

艾略特提出的这一标准已经基本为世界认同，这一标准的意思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是诗人必须与民族文化传统接轨，以继承传统，而不是随心所欲抛弃传统；二是诗人又必须为文化传统提供新质，以改造传统，发展传统。如果做到这二者的平衡，那么，他的创作也就融入了民族文化传统，成为这一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是否能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崭新的内容和形式，是我们衡量经典的标尺之一。因为只有继承过去又蕴含着未来的文学作品，才能不断地衍生出“当代性”，从而经受不同时代的考验。从这个意义来考察郭沫若的哪些作品可以视为经典，首先就要问，郭沫若的创作究竟继承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哪些特质；在此基础上，又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哪些新鲜血液。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请在校的同学随意发表他们阅读郭沫若作品的直观印象，也请老师从不同层面来谈谈教学郭沫若作品的不同体会，看它是否还有为时代所传承，为当代青年所接受的价值。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作为本书的编者，我们可以首先回忆一下对郭沫若作品的直观印象。首次接触郭沫若的作品，是1970年读初中时，那时“文革”时期的老师多是临时聘用，没有经过正规的教育训练，也没有固定的教材。因为过去的教材是“封资修”的东西，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产物，自然作废。新的无产阶级教材又还没有诞生。这倒给了不正规的老师以自由发挥的余地。我们的初中老师自作主张，自选课文，于是在初中语文的第一堂课我们居然读到了《天上的街市》。朦胧的感觉是很美，心想一个悲戚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怎么在诗人的笔下就妙趣横生呢？我后来发现，这一感受并不是我个人才有的。伊沙曾经这样描述过：

中学课本里的郭沫若给我的印象是良好的：尤其是他那优美的散文，名字好像叫《银杏》。然后是《天上的街市》、《科学的春天》——原本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以中科院长的身份所作的一篇发言，也仍然是优美的。华丽的辞藻，充沛的激情，很容易博得一位中学生的反感，跟鲁迅相比尤其如此。（《十诗人批判书·抛开历史我不读》）

伊莎很真诚，忠于自己原生态的感受，尽管他后来对郭沫若作品的阅读感受已经和中学时期大相径庭。

后来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我们在大学首先读了鲁迅，然后就是郭沫若。玩味了鲁迅的深沉后，再来读郭沫若那些雄奇豪放的诗歌，同学们大都有同感：什么玩意儿，诗歌里全是“哟，哟”的。只会喊叫，玩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文字游戏，这能叫诗吗？（现在想来，真是可笑，郭沫若的“浅”像久经熬炼的营养高汤，我们的故作深沉才真是白水一杯）再加上对“文革”的反感，以自己浅薄的理解，或者说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郭沫若是“文革”中唯一不倒的文化旗帜，所以从内心排斥郭沫若，不愿再进一步了解他及他的作品。如果说郭沫若曾经是文化偶像的话，他其实从没有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的青睐。

后来我作了大学教师，按照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列，按部就班地要讲郭沫若的诗歌。因为身在郭老常常提及的故乡，耳濡目染，常常吃着曾令郭老流口水的白宰鸡，常常徜徉在凌云山上、大佛脚下，常常在峨眉山下流连，也就常常想起郭老其人其诗，也就常常在问自己：我们还要读郭老的作品吗？我们学院有幸地处郭老的故乡，离郭老的故居只有几十里路，心想与其干巴巴地照本宣科，还不如坏学生带到故居参观游览，增加一点对这位诗人的感性认识，于是让学生三三两两，自由组合，在绥山书屋前，现场朗读郭沫若诗歌。令我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了，由于学员是一些在职培训的老师，有一定朗诵技巧，读《天狗》、《晨安》、《雷电颂》，那急促的节奏，爆发的激情，使我惊呆了，不知不觉，热泪盈眶，有一种想呐喊想高歌的冲动。

余杰曾经这样描述：

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忧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满是厚厚的墨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 50 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丽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院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有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麻木。（《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按照余杰上述描绘，似乎郭沫若内心的阴暗是因为故居的阴暗拘谨造成的。但是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环境和人的个性之间也存在着反作用。正因为生在四川盆地之中的人，有井底之蛙的感觉；正因为故乡的光照很少，大部分时候，天色是阴沉的，甚至有些灰暗，生在一个气候比较压抑的环境，才使从小就有叛逆性格的郭沫若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夔门，走到了国外。人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其生命能量都是等值的，在故乡无意中被压抑的生命力，一有机会就有可能以井喷之势爆发。有幸的是，郭沫若来到日本的博多湾，那里的阳光和大海与故乡的阴柔形成强烈的反差。郭老对太阳、波涛、新月才那么敏感，那么留恋。在故乡郁积的生命力才有任意挥洒的可能。正因为当年狭窄的天井，才有诗歌中天街漫游；曾经盆地禁锢，才有太平洋的放号。中国几千年来被压抑的精神能量，在《女神》的高歌吟唱中，在屈原的“雷电颂”中瞬间释放。他的诗歌使国人的精神来了一次空前的洗礼和解放，这难道不是民族的庆幸吗？

长期以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部分中国人的心理处于

极度压抑的状态，含蓄深沉、忧郁感伤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学的常态。与西方文学以宣泄的方式而求心理净化的治疗途径不同，部分中国文人不管是对现实的不满，还是人性中固有的情欲意志表现，郁结在心中的块垒，在文学中都以“内化”的方式进行消解。消解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在自然山水中释放自己的情怀，怀庄周还原成蝴蝶，怀人性还原为物性，最终达到以空无灭实有，与万化冥合的人生境界；另一条则是以满足口欲的方式来转移情欲心理，痛饮狂歌。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部分中国文人麻痹自己神经，忘怀痛楚的一种选择。在我国从古到今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少是在隐逸和醉酒中的故作潇洒和超脱，有指东道西、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心机计谋，却很少驻足下来，反求诸己，倾听自己灵魂的颤栗；在中国文学中有欠债与报恩，有时序的循环与人生的轮回，有沧海一粟的个人在无比廓大的自然中的泯灭，却较少有对主体意志的诉求与肯定，较少有青春的成长，性的觉醒，情不自禁，更少有人性深处的情、欲、理的搏斗和厮杀。突然，郭沫若这样的另类文人横空出世，独步文坛，以直白的口语，大胆地袒露了生命的真实需要，抒发了来自灵魂深处的呻吟。它的《少年时代》、《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等，真实地记录了性的觉醒与压抑，性的甜蜜与苦恼，性的扭曲和变态，为保留和研究国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状态，为研究华人在世界中的独特生存状态的参考资料提供了一份珍贵典型的个案事例，但在当时，却是被视作伤风败俗、大逆不道而招致无数的骂名。今天，我们的青少年能在青春成长小说中大胆吐露灵魂隐秘，并被社会宽容地接纳时，千万不要忘记前辈作家以身试中国新文学，为个性解放在中国的实现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文学经典不只是还原这个可批判的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给这个喧哗无意义的现象世界透入人的性灵之光，给这一世界灌注洗涤生命污垢的活水清泉。从这个意义上看，其实当年的郭沫若何尝

不是像鲁迅那样，自己肩扛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所以，郭沫若为中国现代新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质，首先是宇宙意识，即在广阔的宇宙空间，尽情挥洒生命激情的毁灭和创造的意识。古人更多表达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间意识，因为古人更注重华夏民族地大物博，即使惊讶于宇宙如沧海般廓大，其重心也是因为感叹个人如一粟之渺小。而郭沫若从庄子文化中，继承了鲲鹏万里、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他从四川的盆底跳到日本的大海边，简直有了跳出地球的感觉，所以他可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可以似天狗对着日月狂啸，可以让牛郎织女在银河中自由来往。这种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的奇特想像，是中国几千年来极度压抑的心理能量的一次总爆发，这种恢弘的空间意识在胡适那里，有的只是一闪念，在闻一多那里，也只有骑着太阳，绕地球一周的太空旅游的一瞬间。此后，尽管太阳意象在艾青和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诗歌中再一次呈现，但总体来说，随着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渐渐成熟，诗歌更多地沉溺于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忧伤或者调侃，像郭沫若那样单纯、明朗、恢弘豪放的气势很难得以再现。如果说希腊神话之于人类是童年的文学，那么，郭沫若的诗歌之于中国现代新诗则是童年的诗歌。

别以为郭沫若只是一个尖叫的诗人，如果不带偏见地读他的散文、小说，你会发现，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可名状的沉痛，沉痛于忠与孝的冲突，沉痛于社会职责和个体生命激情本能的对立，沉重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宗族人伦规范与生命大爱的冲突。因为在中国，没有绝对的神性意志，神的面目只是宗族群体利益的遮掩而已。关于这一点，从郭沫若旧体诗词《遥寄安娜》、《鹧鸪天四首·悼杨二妹》中，你会感觉到国人这种永恒的痛。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对于这种痛，平庸的人是处在浑然不觉

的状态，他们不知痛，反而快乐着；而知识分子却以先知先觉的情绪体验并承担着这种痛，而且将这种痛苦的感觉喊叫出来，以惊醒他人的“好梦”。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沫若是民族的精神痛苦的表达者、传递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原罪的担当者。我们说郭沫若是球形天才，并不仅仅是说他取得多方面的成就，还应该指他的精神成果中表达着无比丰富的社会冲突和人生矛盾。

其次是郭沫若诗歌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并不等于传统意识，而是传统和当代结合的意识。艾略特认为，诗歌的传统就是一种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这个历史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传统与个人才能》）在他的诗歌中，中国童年文学中的原始意象再一次复活，完成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成功对接，那刚健活泼，充满阳刚之美的神话意象，得到了回光返照的集中呈现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壮观景象了。他的作品通过对古代祭神仪式表演，再现人类古老淳朴的感情对生命本质形态的理解，如死亡与再生、灵魂不朽和自由的追求，显示出人类发展与人类情感经验某些永恒特质。他对“招魂”情有独钟，召来中国传统中神话人物、动物，如再生的女神、《九歌》中的各路鬼神，为的是在古与今的时空跨越中，挖掘文化传统中与现代接轨的自由、创造、永动不息的精神。

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表现了人类儿童时代的纯真，而人类儿童时代的纯真和产生神话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希腊神话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郭沫若的作品也可以作如是观，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儿童时代，由于它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心

理能量，完全具备了今天摇滚乐的功能。今天，中国诗歌从郭沫若诗歌的儿童时代走向了冬天的反讽，不是失语，就是饶舌，不是疯狂，就是晦涩，那么，郭沫若的诗歌是否可以作为文化酵素，再一次刺激中国诗歌春天的回归呢？

郭沫若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在文体形式上与传统的接轨。郭沫若及创造社同仁实行文学上的自由主义的结果，就是回复到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文体形式中去。在许多年后，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小说、散文、戏剧中看到民族文化中的原始风。历史传统中最早的艺术因子仍活跃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原始歌谣、民间传说、历史人物进入作品，成为其基本情节框架。如历史小说《柱上史入关》、历史剧《屈原》。文、史、哲不分家的“反文体”，使他在现代白话文体正朝着“四分法”的方向分出泾渭时，却敢于超越现代，超越时空，回归传统，借古鉴今；既用解构、荒诞、反讽、拼贴等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手法，又在题材和文体样式上，从传统文化和文学中吸取精华。他可以让古今伟人同台对话，又可以解构经典，让圣贤回归平凡。同时，在他的很多小说和大量的书信中，你会看到最宏观的社会波澜和最微观的生活细节，最主观的激情和最客观的写实，最简单的文字和最玄妙的思想，形成巨大的张力，如此的矛盾又如此的统一。这些小说和书信是充满了强烈文学色彩的历史著作和哲学。例如自传体小说《少年时代》和书信《孤鸿》，既有飞扬的激情，生命的沉醉，大笔一挥的写意，又有最细腻的生活细节，纤毫毕露的工笔。在他的笔下，既还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又有置身其中，不断进行人生选择的心路历程。他可以让戏剧里面有诗，诗歌里面有戏剧，小说与散文同在，文学与历史合一。他既超前地站在后现代文化的先锋阵地，又追随着文史不分家的原始文体特色。这一文体特色使他的文本不一定是今天我们界定的纯文学的经典，如果仅从纯文学的标准来对照郭沫若的文本，我们可能会

大失所望。但他的作品应该是文化经典，因为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深深挖掘时，你又会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

郭沫若创作的历史意识，还有语言文字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一想起那一次乐山沙湾故居的现场朗诵会，突然一种感悟涌上心头，原来郭老的诗不只是用来看和读的，而是用来长啸吟诵的。它不是纯粹的书面文字艺术，而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它不能像现代意象诗那样拆解组合，进行文字结构的游戏。郭沫若的诗歌以节奏、音调取胜，以诗歌的口语化见长，他的诗歌更接近于原始歌谣和儿歌形式，更多地表现着人类天性天真烂漫、质朴纯真的一面。由此也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即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歌是不是只有“写诗如作文”、明白如话的追求；是不是真如郭沫若自己所说，是“绝端的自主、绝端的自由”；是不是也有重返诗歌源头的努力；是不是也在重现原始诗歌的载歌载舞的现场表演性；是不是也在还原诗歌作为口头文学的魅力。自镜像文学产生前，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书写文化时代，就误认为文学就是用书面文字写成的文本；文学作品是否作为经典传下去，就在于文字表意功能的强大与否。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往往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和阐释的范式。由于文学文本生产时代和传播时代的时间错位，很可能产生对文学文本隐含信息的“误读”和“漏读”，口头文学的传播更是如此。正是处在口头文字阶段的文学，在弗莱看来，就是春天的文学，充满着热情和狂想。而文学像自然界那样，经历由春到冬的循环后，仍然又有回归原始文学的可能。当然绝对的回归是没有的，它应该是更高阶段的回归，它只是坏过去的一切作为文化资源加以利用。郭沫若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生命觉醒期和复苏期。他是要从原始艺术中寻找时代精神的载体，从中再安放时代的灵魂。就像时装的变换一样，文学也有流行的周期性，但没有完全的复古。原始时代的文学是口耳相传的听觉艺术，是载歌载舞的表演性艺术。

而今，由于数字化、多媒体信息传播革命的兴起，文学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镜像时代。镜像文本是在综合了口传文本和文字文本基础上的更高级阶段，是声、形、色兼具，并大量应用高科技手段的艺术。文学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革，其实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循环发展，是在更高阶段上向原始表演性艺术的回归。郭沫若文学文本让我们看到口传文学与当今镜像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看到了他的作品正是这一链条上强劲的一环。从这个角度来欣赏郭沫若的文学世界，如我们在解读中涉及的《凤凰涅槃》、《光海》、《天狗》、《天上的街市》等，是不是在表达人类的生命原型以及文学的口传性、表演性方面，有它不同凡响的意义呢？今天，我们重选这些作品，不仅从语言文字的表意性功能，同时还通过作品中非语言交流系统具有的表演性特征，来重新审视郭沫若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价值所在。

是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就没有丰富的表现力？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To be or no to be，这是一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文字，但是它却揭示出人生最丰富的奥秘；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最妙的其实不是人人津津乐道的关于荷塘月色的描绘，而是对人的情绪状态的描述，他那句“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这样的大白话，却表达了人在孤独时虚空而又充实的内心世界。唐诗宋词千万首，最终留传的就只有几百首最宜口头吟诵的诗词。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可以留传千古；同理，郭沫若的创造的凤凰涅槃、“洗个光之澡”、天狗的奔跑狂叫等等，以最简单的语言形式，却完成了最奇特的意象组合，创造了一个既是现实的，又是心灵的世界。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诗句，以现代汉语最基本、最普通的词汇，却将中国哲学最玄妙的天人合一，和谐圆融的自然哲学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从而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的想像力，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暗

合了人们要重新弥合这个支离破碎世界的愿望。哥伦布竖鸡蛋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没想到，事后却以酸葡萄心理对此讥诮嘲讽呢。其实有时创造并不需要复杂，而是简洁，今天的信息科学完全可以充分证明，当无数信息都可以从0到9的数字进行表达和处理时，简洁难道不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美吗？

周扬曾把郭沫若比作中国的歌德，其实不如把他比作中国的浮士德更准确。上帝对浮士德说，一个人犯错误并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断行动，不断追求。郭沫若通过他的作品对我们说，个人的是非曲直不要紧，要紧的是给中国人健全人格的塑造以重要启示。郭沫若这只火凤凰，从故乡开始奋飞，然后不断创造，一直到涅槃。它不死的精魂徘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之间，随时给我们以自省和反思，随时在警示我们担当社会职责和人生苦难的勇气。

郭沫若的存在和艺术实践，使中国的文化发展形成一个圆，一个现代和古代首尾衔接的一个圆。然而，这也就使他成为一个尴尬的人物，传统的人嫌他不传统，现代的人嫌他不现代，前卫的人嫌他不“先锋”。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尴尬，而是处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尴尬。这种尴尬实则来源于批评对象和思想观念中的多重矛盾。

因为有批评对象的丰富性，才可能有批评方法的多样性。正因为郭沫若作品“嘈嘈切切错杂弹”的风格，使他的作品具有多元解读的可能性。不管是中国传统的注疏释义、印象点评的方式，还是西方各成体系的理论批评方法，都可以用他的作品小试牛刀。在这本集子里，我们正是本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路径走向郭沫若，去逼近他的灵魂。我们希望从乡村情怀和世界视野，从中西文化交汇，从传统和现代的交替中，再一次咀嚼郭沫若作品的韵味和意蕴。通过